

陈思和 著

当代小说阅读五种

陈平原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陈平原
主编



当代小说阅读五种

陈思和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小说阅读五种/陈思和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8
ISBN 978-7-309-07420-8

I. 当… II. 陈…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3756号

本书原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的“三联人文书系”之一种,以书名《当代小说阅读五种》出版,现经由原出版公司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

当代小说阅读五种

陈思和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孙 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申松立信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6 字数136千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07420-8/I·559

定价: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本丛书原为陈平原先生应香港三联之约编就，并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繁体字版，反响颇佳。因为发行等方面的限制，丛书少为大陆读者所见，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缺憾。蒙香港三联授权，我社今特推出简体字版，但愿对大陆读书界是一种补偿。

陈平原先生曾为本丛书香港三联版撰有总序，略述丛书的编选宗旨和出版的因缘际会，无不精妙绝伦，现移用原序中若干隽语，以为简体版弁言，希望于读者诸君有所助益。

“与当今中国学界之极力推崇‘专著’不同”，陈平原先生坦言：“我欣赏精彩的单篇论文；就连自家买书，也都更看好篇幅不大的专题文集，而不是叠床架屋的高头讲章。前年撰一《怀念‘小书’》的短文，提及‘现在的学术书，之所以越写越厚，有的是专业论述的需要，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缺乏必要的剪裁，以众多陈陈相因的史料或套语来充数’。外行人以为，书写得那么厚，必定是下了很大工夫。其实，有时并非工夫深，而是不够自信，不敢单刀赴会，什么都来一点，以示全面；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眉毛胡子一把抓，才把书弄得那么臃肿。只是风气已然形成，身为专家学者，没有四五十万字，似乎不好意思出手了。”

关于该丛书的编选，作为主编的陈平原先生认为，“与

其兴师动众，组一个庞大的编委会，经由一番认真的提名与票选，得到一张左右支绌的‘英雄谱’，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这既非学术史，也不是排行榜，只是一个兴趣广泛的读书人，以他的眼光、趣味与人脉，勾勒出来的‘当代中国人文学’的某一侧影。若天遂人愿，旧雨新知不断加盟，衣食父母继续捧场，丛书能延续较长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一‘图景’会日渐完善”。

关于丛书的编选宗旨，陈平原先生有三点说明：“第一，作者不限东西南北，只求以汉语写作；第二，学科不论古今中外，目前仅限于人文学；第三，不敢有年龄歧视，但以中年为主——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历史原因，选择改革开放后进入大学或研究院者。”

于今，陈先生的宏愿，经由我们的“加盟”和大陆读者的捧场，可以说已部分得以实现；无论如何，为中国学术的繁荣做点传薪的工作，也是复旦出版人的志趣所在。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7月

自序



本书是应陈平原教授之邀，加入他主编的三联人文书系的行列。体例、篇幅、内文的选择标准，都是参照了书系编辑体例所要求的去做。本来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体例规定有作者小序一项，只好再多说几句。平原教授在总序里所说的“经由十万字左右的文章，进入某一专业课题，看高手如何‘翻云覆雨’”之语，可谓是本丛书的点睛之处。其所谓“专业课题”，让我想起当年周作人提倡的胜业之说，个人有个人可以做并且也能够做的几件事情，那就是“胜业”。如知堂的胜业，由他自己规定的翻译、民俗、小品外，偶然还要管窥一下的日本研究，或者在自己的园地里种几株文学批评的花草。在他有自知之明的时候，守住那几个胜业辛勤劳动，本来也可以衣食无忧地过日子，至于后来一步迈出了胜业的藩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周作人的言与行，从三十年前初次接触时，就成为我私人的座右铭，从正面的或者反面的意义上勉励自己或者警戒自己。今年是个奇怪的年头，由媒体牵头到处都在做一些言不由衷的三十年回顾，可是你真的想回顾一下当年印象，马上又会有许多忌讳出现，到处是不方便说的界定。我在年初时碰过一回墙，以后也就不再开口，转眼已经到了年末，正值编这样一本小书，我忍不住又要想一下，自己的胜业，也就是平原教授所说的“专业课题”，究竟有些什么？



自从内地高校走世界一流的目标以来，所谓的课题越来越重要了，但那首先是要进入国家资助计划中的项目课题。前不久作家阎连科发表了一部小说，写某副教授耗数年之功完成了一部研究诗经的厚厚专著，立刻就傲视一切，以为正高职称、教研室主任、名誉地位加美人，都会自动从天而降，滚滚而来。这实在是不了解目前高校的学科状况。在今天的理工模式量化标准下，专著已经不怎么稀奇了，最重要的是学术论文，而且是在什么什么顶尖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即使你有自己的研究课题，也先要归入某个资助项目课题（最好是省部级以上的），这样才会有钱有势，而像小说主人公那样关在办公室里埋首穷经似地写出来的专著，可能连出版都有困难，没有课题经费，遑论其他梦想。好在平原兄提倡的不是那种专业课题，香港三联也不在乎什么省部级以上的项目资助，他们策划这套丛书的目的，只是文人兴会、舞文弄墨，志趣所向，翻云覆雨。这是何等浪漫的想象。就仿佛在漫漫昏暗的山洞里突然透出一阵有助于生命畅通的新鲜空气，脑子也随之清醒并活跃起来。于是，可以想一想，自己可以做的，也能够做的，究竟做些什么？

当然，第一胜业是教书。自己的职业是教师，三十年来，除了前四年做学生外，接着就做了二十几年的教师，每个学期都是在讲台上消磨生命，看着学生一年年轮换，自己也不知不觉老之将至，这是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感觉，何况也自以为教的方法不错。这么说，教书就是自己的胜业了。教书属于教育的一种工作，但教育的范围比教书要大得多，由喜爱教书兼及教育，对于人才培养事业的关心，对于教书育人作为一种制度的建设，对于教育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以及对现存教育体制种种弊端的批判，应该都属于我所关心的胜业。但其中工作并非是自己都能够胜任的，尤其是我作为教育体制中的一员，八年前更是不得已兼了一份院系的行政差事，明白了其中的许多道理，也增添了

许多的无奈，企图做到的，是现行教育体制下尽可能地保护人文学科正常发展，尽可能保护人文学科的教师在专业上少受伤害，保护他们在专业研究上的积极性。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只要想一想当年蔡元培偶一涉足教育就马上丢官弃职远走海外，此中三昧也只有他自己细细品嚼了。

其次的胜业是文学评论，这本来也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回顾自己三十年来的学习研究道路，进大学前曾经在一家区图书馆服务过，学的是书评工作，包括组织书评讨论，办一份书评杂志，等等，自己也开始写有关当代文学的评论。进大学以后，接受了系统的文学史教育，慢慢知道，光注重当代文学评论，好像不那么“学术”。在当代文学领域，无论是评论还是研究，大约都是不需要弄得几页注释，满纸引文的，所以在高校的中文系里常常是被排挤在学科的末位。过去有种说法，在中文系里，研究语言的看不起研究文学，研究古典的看不起研究现代和理论，而研究现代和理论的没有什么可攀比，除了互相看不起外，就是一致看不起当代文学评论和写作。其实这种阿Q式的看不起风气在我服务的高校里并不严重，但我自己还是受过这种影响的，跻身在现代文学学科，追究五四新文学历史的演变和规律、研讨鲁迅、周作人、巴金、胡风的文学传统，探索中外文学的关系与比较，等等，努力要把自己搞得很“学术”，几十年来也有过几种著述，提出过一些自己的发现。但是，从内心深处的关切和喜爱而言，真正喜欢的还是纠缠在当代文学领域里，像鲁迅纠缠在当时的文学烂泥塘里一样，惹得满身是非，狼烟迭起。由于鲁迅等前辈的纠缠于文坛，使当时文坛的许多本来都遮蔽在堂皇学术外衣后面的阴暗嘴脸和文人劣迹都被须发毕现地照了出来，立此存照了，留给今天的就是一笔极为丰富的遗产，养活

了许多很学术的人。而鲁迅为代表的（还有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人）五四一代作家，以及稍后的巴金、胡风、老舍、沈从文等人，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又是多么精彩，多么富有个性，他们文章的精彩首先是缘于他们生命的精彩和人格的精彩，他们是将自己的生命实践于这个社会，与社会的一切污秽和尘垢纠缠在一起，挣扎在一起，搏斗在一起，他们至死也都是在试图改造中国的环境而不求适应后者，只有当他们中间的某一个动了企图适应的念头（如周作人），他的生命魅力也就消失，仿佛瞎了眼的浮士德最后对魔鬼变幻的世界感到了满意一样。这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与中国当代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坚持了当代立场，五四至今的新文学传统才会散发自身的光彩和魅力，吸引着今天的人们去重新思考自己与历史的关系。如果放弃了当代的立场，把鲁迅一代人的文学变成为死气沉沉的古代文学，我以为这是相当可悲的。

正因为起于这样的认识，我还是回到了当代文学。1980年代我的学术道路是通过研究巴金的文学创作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潮进入五四新文学领域的研究，试图把20世纪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纠正当年这门学科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1990年代我力图在1949年以后的文学领域里开拓主流意识形态以外的话语空间，从而寻找当时的文学史范畴里值得信赖的健康的文学因素。新世纪以后，我的关注点重新回到了当下的文学现场，试图通过对一系列文本的分析，考察文学创作在今天社会发展中的所能够产生的批判意义，以及文学如何对于当下时代精神的审美把握。问题又回到了当代文学，这三十年的道路自己走得并不宽敞通达，仿佛是蚊子飞起来兜了一圈又飞回了原点。不过也不是原点了，当下的文学毕竟与我的

生命一起走过了三十年，今非昔比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为本书所确定的专业课题，是最近几年所发表的有关当下文学创作的研究，研究方法是文本分析，研究对象是五位当红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他们是河南籍作家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山东籍作家张炜的《外省书》和《能不忆蜀葵》，浙江籍作家余华的《兄弟》，陕西籍作家贾平凹的《秦腔》和山东籍作家莫言的《生死疲劳》。说是“五种”，其实是五篇论文，关于《秦腔》和《生死疲劳》的论文，本来是一篇，因为写得长，被杂志社编辑分作两篇刊发了。现在也懒得再合并，就成了这个样子。也并不是说，当下只有这五位作家的作品引起了我的关注，我这几年所写的当代长篇小说文本分析远不止这五位作家的作品，但是把这些评论放在一起阅读，比较能够看出我对于当代文学介入的立场和观念。

这些作品刚问世时都引起过争论，也受到不少评论家的严厉批评，但也许这些作家都是我的同代人，我们是在同一个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当我阅读他们的创作，比较能够看到他们在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世界背后的那张严肃甚至痛苦的脸，也能够听到字里行间透出的挣扎的发自生命深处的声音。我总以为我在这些文字的背后读到了属于自己的体会。我一向认为批评家与作家之间本来就不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而是站在同样的生活前沿，面对时代说出我们自己的感受。所不同的是，评论家需要通过作家们创造的艺术形象来分析时代，表达出来的仍然是我们自己对时代的看法。我不能说，这些文章是我的代表作，但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文章，也是我最近几年所努力探讨，努力思考的结果。

2008年11月22日于黑水斋

目录



自序 / 1

试论阎连科的《坚硬如水》中的恶魔性因素 / 1

试论张炜的《外省书》与《能不忆蜀葵》中的恶魔性因素 / 29

从巴赫金的民间理论看《兄弟》的民间叙事 / 65

试论《秦腔》的现实主义艺术 / 89

再论《秦腔》：文化传统的衰落与重返民间 / 113

“历史一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创新尝试

——试论《生死疲劳》的民间叙事（之一） / 127

人畜混杂、阴阳并存的叙事结构及其意义

——试论《生死疲劳》的民间叙事（之二） / 151

作者简介 / 171

著述年表 / 173



当代小说阅读五种

试论阎连科的《坚硬如水》 中的恶魔性因素

陀思妥耶夫斯基 (Fiodor Dostoevsky, 1821-1881) 在《群魔》的扉页上引用《路加福音》第八章里的一段话：“恰巧在不远之处，正有一大群猪在饲食。群鬼就要求耶稣准许它们进到猪群里，耶稣答应了。群鬼就离开了那人，投入猪群去。那群猪忽然冲下悬崖，掉进湖里统统淹死了。”¹陀氏用这个故事来形容当时俄罗斯混乱的道德与社会状况是否准确，一向是有争论的，但这个“魔鬼附体”的比喻却使人联想到人类历史上某些疯狂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魔鬼”作为一种客体的意象制约了主体的理性，同时它又是通过主体的非理性的疯狂行为来完成一种灾难的创举。关于这样一种介于主客体之间的诗人疯狂的因素，基督教经典与陀氏小说里称之为“魔鬼附体”，而在文学史上，则有一个与此相对应的现象：the daimonic，根据比较直接的理解，可以把它译作“恶魔性”。我们从陀氏引用的圣经故事里还可以进一步来理解这个词：这个故事的背后还有某种拯救的含义，因为当魔鬼附在猪的身上疯狂地跳下河里，那个被魔鬼纠缠的人却获得了拯救。我的理解“恶魔性”主要体现在猪疯狂冲下悬崖这一刹那，它意味着，这种恶魔性同时也包含着某种神的意志，大破坏中包含了大创造的意图。

如果联系到20世纪的世界性现实环境，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恶魔性的忧虑非但不是无的放矢，而且至今还闪烁着先知的光彩。它的现实依据完全不同于以前几个世

1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上），南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扉页。



纪，那是在人类文明获得了高度发展、科学技术使人的本能欲望获得了最大释放的前提下，关于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德国与日本的法西斯运动、犹太人集中营、越战和柬埔寨的大屠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九一一”事件引发的对恐怖主义的世界性围剿，等等，都可以成为重新思考恶魔性这一范畴的材料。本论文正是从这样的思考基础上出发，借助对当代作家阎连科（1958—）¹的一部长篇小说《坚硬如水》的文本分析，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中有关恶魔性的变异形态及其含有的世界性因素的意义。

一、“恶魔性”在世界文学创作中的体现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

The daimonic 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在西方文学创作中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其一般出现在诗人、神学家的创作与议论之中，真正引起文学史批评家的关注似乎还是近代的事。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一部美国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写的通俗读物《爱与意志》²，其中第五章专门探讨了daimonic与爱欲之间的关系。作者在介绍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时，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来介绍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作者在注释里承认，他这方面的论述材料来自沃尔夫冈·楚克尔博士（Dr. Wolfgang M. Zucker）的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The Daimonic: From

1 阎连科，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1958年生于河南省嵩县的一个偏僻小镇。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中篇小说《年月日》、《耙耧天歌》等。《坚硬如水》是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2 Rollo May, *Love and Will*,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74. 此书有多种中译本。本论文引文所依据的是《爱与意志》，冯川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



Aeschylus to Tillich”。这篇论文现在已经公开发表了¹，如果对照两者的内容，在历史知识方面，罗洛·梅的书里确实没有提供更多的东西。同时，从这篇论文里所引用的相关资料里也可以看到，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只是就单篇作品中的恶魔意象发表过一些片段看法，并没有系统地给以阐述。而远比他们更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第一个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论述恶魔性因素的，是中国的鲁迅（周树人，1881—1936）。他的《摩罗诗力说》写作于1907年²。

罗洛·梅和楚克尔在探讨恶魔性³时都追溯了古希腊时期的daimonic一词，其词根是daimon，古希腊语则是δαίμων。根据这样的提示，我们不妨来分析这个词在古代希腊文献里的原始意义。

这个词在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里经常出现。在柏拉图（Plato, B.C. 427—347）对话里，《申辩篇》里记载苏格拉底（Socrates, B.C. 469—399）被人指控有罪，他的罪是他腐蚀了青年人的心灵，相信他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国家认可的诸神。苏格拉底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他自己

1 Wolfgang M. Zucker, *The Demonic: From Aeschylus to Tillich, in Theology Today*, Princeton, April 1969, Vol. 26, No. 1, edited by Hugh T. Kerr ed., pp. 34—50. 中译本出版较晚，见杨宏芹译《魔性：从埃斯库罗斯到蒂里希》，载《国际文学人类学研究》（《人文新视野》，第五辑），史忠义、卢思社、叶舒宪主编，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66—82页。本章节论述的部分材料也参考了该论文。

2 摩罗诗力说》写作于1907年，初刊于《河南》杂志第二号和第三号，1908年2月和3月。现收入《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3 对恶魔性这个词，罗洛·梅和楚克尔使用的英语各不相同，前者用the daimonic，后者用 the demonic；尽管罗洛·梅在《爱与意志》中认为这两个词只是拼写不同而已，但demonic与daimonic的用法仍有所不同。demonic的含义有两种：一、恶魔的，魔鬼似的，邪恶的，残忍的；二、力量和智慧超人的，像一种内在的力量、精神或本性那样激烈的、有强大和不可抗拒的效果和作用的，非凡的天才的。当用作第二种含义时，为了区别，一般拼写成daemonic，与此对应的德语词是dämonisch；而daimon又与daemon等同，所以，结合本论文所探讨的内容，既可以选用daemonic，又可以用daimonic。以上内容参见：Ph.D. Philip Babcock Gove ed.,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U.S.A.: W. & C. Merriam Company;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 I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C.T. Onions ed.,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的神灵是他从小就相遇的一种声音：“我与之相遇始于童年，我听到有某种声音，它总是在禁止我去做我本来要去做的事情，但从来不命令我去做什么事。”他说，为了服从神的命令，我接受了这种义务，神的命令以神谕、托梦以及其他各种神圣天命的形式出现¹。正因为这种daimon是以神秘的方式接近他，所以他不可能违背它的声音，甚至就在他被判决死刑的时候，因为那种灵异的声音没有来阻止他，所以他慨然赴死。从《申辩篇》里的描写可以得出几个印象：一、daimon是一种与当时希腊国家承认的诸神相对立的神灵，从正统的观点来看，也可以称之为“魔”；二、它是以某种神秘的方式来接近人，指示人的行为，也就是所谓“魔鬼附体”；三、它对于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具有某种破坏性，以至于国家要对苏格拉底处以死刑；四、被附体者对这种力量的服从高于一切，甚至于生命，因为他在这种对既成秩序的破坏里面感受到一种未来新世界的创造。

柏拉图的另一篇对话《会饮篇》里，柏拉图又通过苏格拉底与女巫第娥提玛的对话，讨论了daimon与爱神的关系。第娥提玛告诉苏氏：爱神爱若斯（Eros）不是神，而是介乎神与凡人之间的daimon。这种拟人化的daimon是人与神之间的传语者和翻译者，他们感发了一切占卜术和司祭术，一切关于祭礼、祭仪、咒语、预言和巫术的活动。神本来不和人混杂，但是由于daimon的存在，人与神之中才有往来交际。爱若斯就是daimon中的一个，他的来历十分可疑，是“富有”神醉酒后与“贫困”神交配而生的孩子，他粗鲁丑陋，赤着脚，无家可归，但是他又有着

¹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22、30页。由于各种译本对daimon的译法不同，本论文为了方便阅读者理解，在引用译文时，这个词一律用原文。



“富有”的血统，追求善和美，敢于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为了达到目的而诡计多端。柏拉图进而论述了，这样一种爱的力量其实是来自于生殖的冲动，也就是生命延续的本能需要¹。柏拉图第一次论证了daimon与性爱的关系，换种说法，daimon包括了性的冲动和原始的生命力，是一种把神性与人性结合起来的力量，它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人自身的内在生命驱动力。对爱欲的这种理解后来直接启发了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里比多的理论，他爱把自己的理论与柏拉图的爱欲说挂起钩来²。这个词还出现在古希腊的其他哲学家的著作里，如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B.C. 540-470）有一句名言：人的性格就是他的daimon³，也就是把这个概念与人的内在的某些因素联系起来。

在古希腊悲剧里，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B.C. 525-456）的《波斯人》里直接使用了daimon这个词。它的故事是古代波斯王塞尔克塞斯统兵二十万和海船六百艘大举入侵希腊，过赫勒斯庞特海峡的时候，他企图用锁链像锁住奴隶那样锁住大海，结果这种狂妄的念头使他大败。悲剧并不是正面表现战事的失败，而是通过波斯王的母亲的噩梦和父亲大流士亡灵的显现，来叹息波斯王的悲剧命运。下面是大流士与他妻子阿托莎的对话：“如此庞大的军队，他的陆军，何以过得海峡？”“精巧的设计使他辄连起赫雷的港湾，开出一条路线。”“什么？他越过了波斯普罗斯海域。”“是的，是某位神明，使他如愿。”“悲啊，必定是某位强健的daimon的干预，使他痛失理智。”接着

1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40—241页。

2 转引自Douglas N.Morgen, *Love: Plato, the Bible and Freud*,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4, p.173。弗洛伊德接受柏拉图的爱欲观点有过一个过程，可以参见罗洛·梅的《爱与意志》，第80—90页。

3 转引自杨宏芹的中译本，见《国际文学人类学研究》，第69页。